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论中国特点的经济伦理问题研究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Book chapter
Authors	陆, 晓禾;Lu, Xiaohe
Publisher	Globethics.net
Rights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s (CC-BY-NC-ND 2.5; se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2.5/legalcode)
Download date	2026-06-23 16:35:40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56862

ON STUDY OF CHARACTERISTICS OF BUSINESS ETHICS ISSUES IN CHINA

Lu Xiaohe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ose characteristics of ethical issues in business in China which seems different from, even opposed to, the trends or principles of Western mainstream business ethics. It first analyses some issues in detail, then discusses difficulties with trends of business ethics in China. The paper finally suggests some tasks for building norms of business ethics addressing issues unique to China. The author's main point is that we should not neglect a characteristic Chinese study of business ethics, even though the business is becoming more globalized.

Key words: Globalized economy; Business ethic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u Xiaohe
*Professor, the Center for Business Ethics Studies/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P.R.China*

第 6 章

论中国特点的经济伦理问题研究

陆晓禾

[内容提要] 经济全球化正在推动“全球经济伦理”研究的兴起。在普遍重视“全球经济伦理”之时，我们应注意中国特点的经济伦理研究。因为：(1)中国市场经济还处在初级阶段，经济全球化并不能改变这一现实。(2)目前在“全球经济伦理”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伦理成果是在西方环境中产生的，中国经济伦理问题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不可能照搬西方对这些问题的规范成果。(3)某些被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否定的价值取向恰正是现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我们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而有一个如何恰当地肯定和规范的问题。所以，弄清中国经济伦理问题的特殊性质和情形，确立中国经济伦理规范所应坚持的立场、标准和原则，对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经济伦理学；中国特点

“中国经济伦理问题”就是具有中国特点的经济伦理问题。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共性，很容易使我们忽略中国经济伦理问题的特殊性。但是：1)市场制度只是经济制度的结构因素之一。它要同其他结构因素结合，才构成现实的经济制度。市场制度与其他因素多种结合的可能性，使特殊的市场经济成为可能。经济制度一般包括三个部分或层面：所有制、信息和调节制度以及动机，可分别简称为所有制、体制和机制层面。所有制问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谁参与经济决策，谁计划和控制生产、分配和消费；体制问的是：决策者在什么信息制度帮助下调节生产和交换，市场还是计划；机制问的是激励机制或动机问题：什么动机和目标驱动决策者，选择什么方式履行决策或期望何种行为形式，自利、公利或忠诚等。对这三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特点不同的经济制度。当人们说市场经济时，着眼的是决策者在市场制度帮助下调节生产和交换这一特征，是按这一特征对所有实行这种体制的现实经济制度的一种概括。市场调节体制、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或者说共性是：由市场而非政府或少数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市场交换按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作为市场必要部分的自由竞争，受利润支配，资金随利润转移，资源和劳动力自由流动，价格和工资受供求关系支配。按这特征来看，也可说经济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基本要求的全球化。但这并非说各国经济制度都是同样的结构组合。换言之，各国经济在市场经济的一般情形和性质之外，还有其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例如，有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比较完全的自由市场，如美国，有的是不完全的自由市场和受限制的财产权的组合物，如瑞典、联邦德国、丹麦、日本和瑞士等的混合经济。2)经济制度总是体现在一定文化和政治背景中。因此经济制度除结构因素组合不同有其特殊性外，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法律因素也制约和影响着的运作，因而也具有特殊

性。例如《国家竞争力》一书，就按文化背景区别出七种类型的资本主义。⁴⁴ 经济伦理问题同产生它们的各种特殊的社会经济有关。西方经济伦理问题，例如美国经济伦理问题，是在他们的经济制度、社会文化和伦理观念背景下发生的。美国经济伦理学运动、经济伦理学科就是从他们面临的问题开始的。西方经济伦理问题，按恩德勒的概括，“是来自实践、有难处理的经历和可引起争论的伦理判断”。换言之，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议题、引起人们的争论，是相对一定社会人们的实践活动、经历及其伦理观念而言的。例如“经济人”问题、利润动机问题、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等，都是在美国引起激烈争论的经济伦理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结果，便构成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美国经济伦理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规范。

应当肯定，他们的问题和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认识市场制度的一般情形和性质。但这是市场制度的基本要求在他们的制度结构和社会环境中所显示的情形和性质。我们则有特殊的情形及性质。我们的制度结构和环境的特点是：1)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状况是市场制度与社会主义结合，具体说，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市场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至于机制，下面要谈到，还有争议，但大致上是功利动机。2)以这种状况为目标的中国经济制度存在于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构成的特定环境中，后者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前者。例如，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并非市场经济的要求，而是有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历史传统方面的原因。市场只是维护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手段。3)我们的经济制度和特定环境还处于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中，与不同文化的目标概念和价值观念碰撞，并受其影响。这点决定了我们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面临着三方面的协调任务：1)协调市场制度与我国经济制度其它部分的关系；2)协调

⁴⁴ [英]查尔斯·汉普登·特纳、阿尔方斯·特龙佩纳斯著：《国家竞争力——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徐联恩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我国社会和文化部分的关系；3)协调我们特色的市场经济与全球市场中的其他市场经济的关系。中国经济伦理问题可以说就是在这三种协调要求中产生的。想在下面讨论两种情形的中国经济伦理问题，一种是问题特有，另一种是表现形式特有。

6.1 “经济人”问题。

西方经济伦理学可说是从否定“经济人”开始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将经济主体抽象为“经济人”，并以此作为经济分析的前提。由自利动机驱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概念的基本内涵。这一概念在美国“经济伦理运动”中被斥为“神话”。他们认为，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主体是负有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的“道德人”，有着远比“经济人”丰富的内涵。对经济主体的这种新认识，后来促使阿马蒂亚·森等学者进而提出“多元动机模式和多元目标框架”。⁴⁵西方经济伦理学的许多概念规范都建立在对经济主体的

这种新认识上。令我感兴趣的是，我们也提出了“经济人”问题，但与他们的情形不同。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例如，雷锋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会怎样？作为经济人，他是否也会或应当斤斤计较？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是否还要雷锋精神？如果回答还是肯定的，那么经济人与雷锋精神如何协调？从长达 20 多年的讨论看，理论界多数倾向于两重伦理格局，即认为经济人的自利原则与雷锋的奉献原则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值得注意的是，新近有学者明确肯定，经济人是一个科学概念。经济人的本质特性来源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结构。商品和商品劳动的两重性决定了经济人本性的两重性：利

⁴⁵ Amartya Sen, “Does Ethics Make economic Sense?” In Paul M. Minus ed. *The Ethics of Business in a Global Economy*,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 p. 53.

己和利他。因此经济人的道德属性是经济人活动本身就具有的，因为经济人本身就包含了作为否定环节的道德。换言之，经济人概念是抽象的，而进入经济关系中的现实人是具体的，因此必然包含道德。因此经济人的自利动机是道德的，经济人的手段和活动结果也受道德制约。他还认为，经济人的伦理属性与社会普遍道德有共性，同时也有其特殊的道德评价标准和规范，如自利原则、等价交换原则等，是经济人区别于政治人、文化人、社会人等的道德的特殊要求。适合经济人的道德要求不能泛化为社会人的道德要求，同样社会生活的某些普遍性道德要求如助人为乐、关心爱护他人等也不能引入经济人的经济活动和道德要求中。⁴⁶ 这一观点很值得重视，因为同西方经济伦理学成果形成鲜明对比：1)西方现在是从抽象到具体，否定抽象：通过使抽象的经济人回到具体的现实的人，否定抽象的经济人。而我们则是从具体到抽象，肯定抽象：通过对具体的现实的人的分析肯定抽象的经济人的合理性。因此西方强调的是整体的人，我们则是经济人与政治人、文化人、社会人的区别。2)在道德方面，现在西方要求的是完整性(integrity)：人在各方面都应一以贯之，信守同样的道德原则，保持同样的道德品性。而我们主张的是两重道德论或双重道德标准论，如同过去西方哲学中的两重真理论：一方面是自利原则、等价交换；另一方面是助人为乐，关心爱护他人。因此，同是经济人概念，在我们这里所引出的问题、采取的观点和提出的伦理规范都不同。两重道德论在理论上是存在问题的，完整性概念否定的就是这种自相矛盾的道德状况。因此，如果我们坚持两重道德论，就必须回答完整性挑战。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它的实践意义、矛盾根源是什么，究竟应如何看待这问题，或者说如何协调经济人与雷锋精神？

⁴⁶ 章海山：“解开经济人的伦理情结”，《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6.2 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否仅仅增加股东的利润，这问题在美国曾引起激烈争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密尔顿·弗里德曼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因此成为众矢之的。⁴⁷ 中国MBA学生在西方教授的课堂上，也给他写了上千封未发出的信，讨论他的著名观点。大体说来，西方经济伦理学界现在都抛弃了弗里德曼的观点，普遍采用关民(stakeholders)概念：企业不仅应对股东负责，还应考虑所有与企业利益相关、受企业活动影响的人的利益。“考克斯圆桌原则”承诺的第一原则就是关民原则。企业的责任也并非就是增加利润，还应承担社会和环境责任。然而，令西方教师吃惊的是，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都倾向于赞成弗里德曼的观点。对我们来说，这种反差并不难理解。“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企业在观念上与国外企业有很大不同。中国企业不仅要考虑利润，还要负担多重经济和社会目标，如地方政府的税收和解决就业问题等，造成企业效率低下。”⁴⁸ 因此，中国同西方恰正处在相反的运动中。如果将企业、政府、社会看作三大圆圈的话，在西方，是从过去的完全分离到现在要求的部分重叠，而在中国，则是从过去的完全重叠到现在的逐步分开。因此，在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上，西方的问题是企业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中国的问题是企业不应当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因此，至少目前在中国，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不合时宜的，这也说明了为何中国学生大都赞成弗里德曼。不过我们要考虑的是，正在进行的这种分离运动，到哪里才是适当的，伦理根据是什么，政府、企业和个人在这方面如何公平承担，根据我们面临的问题借鉴西方的

⁴⁷ Milton Friedman(1970).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13.

⁴⁸ 《上海金融报》，2000年8月17日。

教训，掌握好社会责任的度。但这些都必须放到中国环境中才能认清。

6.3 主人翁精神问题。

雇员作为公民在工作单位能否行使公民权、雇员能否作为企业真正合作者来看待，有否参与公司规划和管理的权利，也是西方经济伦理学讨论的重要问题。随着对知识经济的认识，他们还考虑如何发挥工人的创新精神，为此不仅要求所有者向经营者让权，还要求主要经营者向下级经营者和企业以外的有知者放权和让权。换言之，考虑的是：非主人如何发挥主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我们这里，则是另一种情形。从理论上和法律上说，工人是国家和国有企业的主人。主人翁精神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选择和期望的激励机制。但随着企业用工、双向选择和契约化，“主人”也面临着下岗问题。同时，主人翁精神的合理性也发生问题。例如有专家提出，由于企业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许多经营方面的秘密，不能“厂务公开”。因此，“如果真正懂得一点现代企业的运行之道，也不会对发扬所谓‘主人翁精神’抱有希望。‘主人翁精神’应该体现在政治领域，而在企业里，厂长与工人的关系，应该体现在现代企业的分工思想，厂长治厂，工人做工，各自干好份内事。”⁴⁹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的主张又相反：在西方，理论上，工人的权利在扩大，从社会到企业，从做工到参与管理；在中国，工人的权利在缩小，从企业退到政治领域，从参与管理下降到做工。”作为国有企业和国家主人的工人是否可下岗，理论上如何解释？我曾就此提出过问题。后来理论界对此的解释是，这种主人地位在宪法中并没有变，具体工人下岗只是体制问题。从现在的情形看，则进而连“主

⁴⁹ 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工运研究资料专辑》第154期，2000年第8期，第4页。

主人翁精神”也被请出了工厂。主人翁精神的根据是主人翁地位，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传统，是适用于工人的伦理品性规范。这一变动，一方面将使许多伦理规范发生问题，例如许多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章程中都有“爱厂如家”这一条，根据就是“工人是企业的主人”，那么现在这类规范是否还有意义？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用什么替代伦理规范来调节工人与企业、工人与厂长的关系问题，如果主人不行，那么是否雇员？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到，随着市场制度的建立，所有制和机制及其相关的理论解释都在发生变化。当我们放弃主人翁精神的时候，实际上诉诸的就是功利动机。这同西方现在强调的多元动机结构恰好又形成对比。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主人翁精神，无论是放弃还是提倡，都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给出经济伦理的证明。

6.4 公有资本人格化问题。

这是只有我们才会提出的问题。也是经济伦理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十五大”报告提出了“公有资本”范畴，理论界进而提出了“公有资本人格化”问题。资本当然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如下立论根据：私有资本带来的归资本家，具有剥削性质，而公有资本归劳动者或部分劳动者所有。这就使公有资本的提法有了道德根据。那么公有资本人格化是什么意思呢？“公有资本的人格化就是具体的人对公有资本的命运和运行铁心负责的一种特有机制。”如何能做到铁心负责？通过什么机制？有四者：竞争机制，利益激励机制，监督约束机制和道德支撑。⁵⁰我觉得这提法本身值得商榷。为何要人格化？人格化是否异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恰正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才会提出的问题。而从实践看，

⁵⁰ 乔法容：“公有资本人格化的经济伦理学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则反映了一种更紧迫和深刻的矛盾。紧迫：国有资产管理者的忠诚问题需要解决，否则无法保证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如果过去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无效率，那么现在则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或消失。深刻：由于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加上多层复杂的委托代理体系，不仅国有资产管理层与所有者的利益发生分化，而且缺乏最终所有者对委托代理者的约束，因此，如何使现代公司制管理层具有过去私人资本家对自己企业铁心负责的精神，这实际上是中国与西方都关心甚至向往的问题。在西方，方案是多元动机目标机制。⁵¹ 在我们国家，因为是公有资本，具有伦理正当性，因此直截了当地采用了“人格化”这种极端的要求。

关于中国特征的经济伦理问题还可举出许多。如关系问题、私有企业的地位问题、员工的权利问题等。在此不能一一例举。从上述讨论看，与西方经济伦理相比，中国经济伦理问题具有如下特点：

- 1) 逆向性：如经济人问题上，他们否定，我们肯定，他们从抽象到具体，我们从具体到抽象；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上，他们从分开到交织，我们从交织到分开；在主人翁精神问题上，他们提倡，我们放弃。
- 2) 转化性：本来“资本的人格化”在我们的伦理观念中是贬义的，但通过与“公有资本”结合，就具有了伦理正当性；又如“经济人”在我们的观念中也是贬义的，但通过商品两重性概念获得了道德性。
- 3) 两重性：例如，经济人问题上，经济领域里的自利原则与社会领域的利他原则并立；主人翁精神问题上，政治上的主人与企业内的非主人并立。

这些都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和特点是怎样产生的？它们的发展趋向将会怎样？这就引出了下面有关难题的讨论。

⁵¹ 陆晓禾：“论管理经济的制约机制”，《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6.5 中国经济伦理学的难题

上面曾提到两种协调，即协调市场经济与社会其它部分的关系、协调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与全球市场经济的关系。协调是因为有矛盾或冲突，否则经济和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这两种关系可以说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关系。

第一关系主要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市场经济是靠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运行并在其框架中运行的。例如，市场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用，市场经济就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但这经济所要求和产生的与推行它的框架并不完全相容甚或是矛盾的。例如，集体主义是改革之前中国社会道德的根本原则，“改革是硬道理”，市场经济改革就是在符合、有助于集体利益前提下开展的。但现在，集体主义原则不仅难以调节市场经济关系，而且还被要求与个人主义原则分享其地位甚至取而代之。社会也倾向于金钱、功利、个人利益、知识能力取向，道义、奉献、集体利益、重德等传统价值的地位在下降。⁵² 私营经济在宪法中获得了“重要部分”的地位，提出了“不要优惠，要平等”、要入党等政治要求。与主人翁精神遭到冷落形成对比的是，“温州精神”开始受到推崇。这种此消彼长、纷争碰撞的状况，促使文化各部分互动。中国经济伦理问题及其特点就源于这矛盾。由于这些都发生在我们所称的“转型期”，因此也可笼统地说它们具有过渡性。但我们有必要知道这种状况的发展趋势（这一点留到后面谈）。

这种状况使中国经济伦理学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它是应用伦理学，但一般伦理学发生了问题，没有统一可公认的道德原则。⁵³

⁵² 文崇一：《中国人的价值观》，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年10月。陆晓禾：“关于当前人们价值取向的社会调查和理论思考”，《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⁵³ 陆晓禾：“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伦理学：回顾与展望”，《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研究》，1999年第5期。

这也是我们同西方经济伦理学不同的地方。后者无论就其社会宗教信仰还是人道主义价值体系，都具有相对稳定性。对他们来说，困难的是如何用这些相对稳定的伦理原则规范来解释新问题，因此有一个如何应用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则不仅有应用伦理问题，更是一般伦理原则的问题。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功利原则还是奉献原则？尽管理论上可以谈论两重道德格局，但在实际应用中则会发生问题，使人们无所适从。例如上海调查中，就有近五成市民感到“许多事情不知道是好是坏”，缺乏了是非标准。⁵⁴

中国经济伦理学面临的第二个难题，即实践难题是：经济主体没有完全形成。道德评价的对象是道德行为者的行为和品性。但经济主体不清晰，道德主体也不清晰，致使行为者的权限不清，道德责任也无法落实。特别是宏观与中观层次的关系存在“理还乱”的状况。例如，尽管不少国有企业已转为公司制企业，但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产权过分集中，决策政企合一，使政企很难分开。因此作为法律上独立自主的法人，无论从现实关系和观念看，都还未真正形成。

中国社会要协调的第二个矛盾是，我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与全球市场经济主要是西方市场经济的关系。如果前一个矛盾主要由改革产生，那么后一个则与开放因而与参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市场经济需要有起码的行为规范。在全球化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西方社会共同的价值标准。美国曾因两种国际商务伦理模式发生争论：客国论和本国论，前者主张“入乡随俗”，后者坚持本国标准。由于“完整性”、公平竞争等考虑，现在实际上趋向于本国论：成为国际规范的是西方社会认可的伦理原则。但由于两个原因，中国与西方价值观存在分歧和冲突：1)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我们

⁵⁴ 陆晓禾：“关于当前人们价值取向的社会调查和理论思考”，《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同他们的分歧主要不在于是否保持国有企业，而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例如人权观上，所以有学者提出，我们应冷静考虑西方是否允许我们在保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加入WTO的问题。2)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美国著名经济伦理学家罗伯特·所罗门 (Robert C.Solomon) 认为：“资本主义成功并非因为它使人致富，而是因为它产生负责的公民和繁荣的社会。它不可能长久容忍经济活动只关注利润和粗俗，忽视传统责任、社会和整体美德。”这番总结从德性方面区别出资本主义的两个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多种所有制的市场经济，勿庸赘言，私有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处于初级阶段或原始积累阶段，具有它的粗俗气或唯利是图性。这种德性不仅同国有企业矛盾，而且同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市场规则也发生矛盾。就此而言，是弱势的初级阶段的粗俗的市场经济与强势的高级阶段的精雅的的市场经济并立。理论上和实际上趋向的是顺从高级的“与国际接轨”。“过去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是按国际规则出牌”。但问题是，初级阶段能否跳过，而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之间有竞争关系，因而也影响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种历时发展阶段同时并存状况使我国经济伦理学面临第三个难题，即国际压力。有人将它称之为伦理帝国主义。一方面，我们必须遵循国际经济伦理规范，否则难以融入全球经济中；另一方面，如中国经济伦理问题的特点所显示的，我们同他们正处在相反的运动中，完全与他们接轨，某种程度上等于压制和妨碍我们自己的发展。如何既保持我们的经济活力，又符合国际经济伦理规范，也是中国经济伦理学面临的一大难题。

受这两类矛盾影响的我国社会道德的发展趋向将会怎样。

首先，并立的或两重道德的格局不能避免双重道德标准的矛盾，因此有可能采取包容的办法，即一方放弃并立地位而成为另一方的构成因素。如何包容？有两种可能：传统西方市场经济型伦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或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伦理，后者可能性更大。因为当代西方经济伦理、中国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伦理倾向有可能结合并加强，例如，经济伦理学在中国并未经历西方“从无稽之谈到新学科”的困难过程。而恩德勒的《中国国有企业的伦理指南》，就以当代西方经济伦理、中国儒家传统伦理和社会主义伦理为共同依据。⁵⁵ 总起来看，中国市场经济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利于这种伦理体系的生长。

6.6 几点看法

在分析了上述难题和可能趋势后，现在对中国经济伦理学今后的发展谈如下几点看法：

1、坚持历史标准，促进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

对难题和可能趋势的分析，并不能代替评价标准。中国市场经济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利于限制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粗俗野性，但如果不注意中国经济伦理问题的特点，简单搬用西方经济伦理原则，也容易压制它的生长。因此在中国市场经济初生之时的关键阶段，应坚持历史标准，主要应肯定市场经济功利取向、利润取向的合理性，同时兼顾另一种倾向，考虑传统教诲和西方教训。如果过分强调后者，不注意主次，事实上也就不利于市场经济因素的成长。近代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同样值得研究。重商主义对金钱的崇拜、亚当斯密对自利追求的颂扬、萨伊有关保护正当个人利益的主张，都对催生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有过重要作用。这些有助于我们正确评价目前市场经济带来的金钱、功利等取向，不应以粗俗与否取舍。在我们强调市场经济负面影响之时，指出这一点是有意义的。据研

⁵⁵ Georges Enderle (1997). "Ethical Guidelines for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8/4, pp. 1177-1192.

究，从 1979 年到 1998 年 20 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 9.7%，其中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 1 个多百分点，而制度创新才是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真实动力。⁵⁶ 制度创新实际上就是释放和调动了人们正当追求富裕的激情。因此，恰当地肯定金钱或功利取向，对促进经济增长是很必要的。市场经济与社会文化等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正常的。经济伦理学可通过转化、结合或减缓前者的张力、负面影响等来协调同后者的关系，促进市场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2、研究和形成经济伦理规范，促进社会基本道德规范体系的形成。

由于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伦理未充分发展，因此目前能够沿袭的或者是儒家人伦规范，或者是政治和哲学概念。这种状况落后于实践需要。国内各经济层次、领域已经提出许多伦理问题。经济伦理学是规范伦理学。研究和形成用于处理中国经济伦理问题的经济伦理规范是它的基本使命。此外，尽管它是应用伦理学，但它同经济实践关系最密切，因此可以从特殊的经济伦理问题出发，进而追溯或上升到一般伦理学层面来研究，提出或论证哪些一般伦理规范是可行的，用这种方式，促进社会基本道德体系的建设，使自己成为后者的新生长点。

3、逐步摆脱两重道德格局，建设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伦理和社会道德体系

中华民族传统上不是功利主义民族。我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强调的是只有人的道德和学问是靠而且能够靠人的努力获得的。因此即便我们“寝蓬室，隐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环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因此情结，能够推动我们逐利的的动机不会是或不可能满足于简单的功利，而是更深刻的事业或道德

⁵⁶ 《奥港信息时报》，2000 年，第 5 期第 14 页。

动机动机。由这种精神的道德的动机肯定的功利动力，往往会超出功利动机，不计功利，如中国许多民族企业家所表现的那样。因此我们有理由以这样的动机结构作为经济伦理以至社会道德的基本结构：以事业性、民族忧患意识作为推动功利、肯定功利的环节。只要我们抓住这个环节，用这个环节来推动、升华功利动机，那么就有可能摆脱两重道德的问题。简言之，给功利动机以事业性、民族性，即给它以道德根据、方向和力量。

原文载于《哲学研究》2001年第8期